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第二辑

DANGDAI ZHONGGUO TUSHUGUANXUE YANJIU WENKU

WenXianXue Yu WenXian XueJia

文献学与文献学家

王余光/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二辑）

文献学与文献学家

王余光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献学与文献学家/王余光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10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第二辑)

ISBN 978 - 7 - 5013 - 3746 - 0

I. 文… II. 王… III. ①文献学—中国—文集②文献学—学
者—人物研究—中国 IV. G256 - 53 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9546 号

书名 文献学与文献学家

著者 王余光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25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0(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3746 - 0/G · 755

定价 48.00 元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 主编：**吴慰慈 陈源蒸
- 编委：**陈源蒸 中宣部出版局研究馆员
郭又陵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李万健 中国图书馆学报编审
李致忠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
- 倪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斐章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谭祥金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
吴慰慈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引麓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总序

在人类文明史上,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的产生几乎一样源远流长,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相互交叉的联系,在追溯历史渊源和面向现实与未来中,有着同源和相互运用、共同发展的关系,有鉴于此,编委会将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合为一辑,列入《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中。收录在本辑中的有倪晓建、王余光、陈力、王世伟、柯平、王新才、徐雁、王国强等当代中青年学者的文集。倪晓建、柯平、王新才、王国强主要研究目录学。其中倪晓建通过提出精萃信息理论而深化了目录学研究;柯平则以数字化目录学研究创新了现代目录学理论;王新才于目录学发展多所着力,对目录学演进的阐释相当独到;王国强深于古典目录学研究,尤其是汉代与明代,更是其着墨重点。王余光、陈力、王世伟等人则主要研究文献学,其中王余光主要研究文献史与文献学理论,陈力、王世伟则于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用功甚深。徐雁的主攻方向是藏书与读书。这些中青年学者思维敏捷,才华出众,成绩卓著。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潜心学问、甘于寂寞并扎实钻研的精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并值得提倡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年正好是30年。30年中,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几位中青年才俊,或在这一年,或在这之后不久,陆续步入图书馆学的殿堂。虽然这些进步不能说就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的研究无疑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他们的成果是新时期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记录。也许有人会质疑,那些注重思辨考证的“纯粹”的研究有什么用呢?胡适当年就曾把考证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新星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具有相同的价值。考证古籍版本、研究藏书目录有什么用呢?这些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却

繁荣了学术文化。考证古籍版本,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作者思想;探讨藏书目录,有利于了解各时代藏书情形,也对今天的藏书建设有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从藏书、目录、版本等研究出发,还可以推荐图书、指导阅读。这几位中有不少致力于这种研究,也有不少还在致力于这种实践。图书馆学、文献学、目录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文献信息资源的管理,更应当探讨如何让这些资源充分发挥作用。尤其是目录学,作为一门智慧之学,它教给人们的便是学会如何在浩瀚的文献知识和信息的海洋中迅速准确地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的本领,拥有这种本领和能力将会终身受用无穷。如果读者能从图书馆了解到怎样读书、有哪些书可读、书以哪种版本为好、先读哪些书、后读哪些书、哪些书需要精读、哪些书只需浏览,这样,就可以说图书馆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学习型社会中充分发挥了文化教育的功能,也可以说我们的文献学、目录学研究并非全然虚不可用。文献目录之学本来就是致用之学,而其所致之用,应该说正是这些方面。

这些中青年学者是正在成长中的大树。他们潜心钻研,开拓创新,吸取养分,并逐渐枝繁叶茂。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图书馆事业这片沃土,而图书馆事业也因他们的研究而变得生机勃勃。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终将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顶梁柱。是为序。

彭斐章

2008年2月于珞珈山

序

王余光同志是我的忘年交，熟悉得不得了。

王余光同志是我系即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称“信息管理系”）1979级入学、1983年毕业的学士。在校时各方面都已突出表现。他与我系比他班次低的徐雁、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钱婉约等几位组织“学海社”，此社为当时北大学生社团中之翘楚，奉王了一（力）老师为总顾问，以下顾问颇多，几乎网罗尽北大当时与文献学有关的教师，在下亦有幸忝列其中。他们请顾问并非备而不问，而是经常咨询。因而，我与他们特别是王余光、徐雁两位颇多往来，这也因为是同系的缘故吧。我发现，学海社社员中胸怀大志有志于将来在文献学方面开疆辟土者不少，王、徐、钱三位尤其突出。我判断，二十年后，学海社中的一些位必成为我国文献学界主力。今幸所料不虚。钱婉约女史是国学大师钱宾四（穆）先生的孙女，家学渊源，与余光志同道合，结为伉俪，比翼齐飞，更是当代文献学界佳话，人皆艳羨焉。

王余光同志自北大入学后即肆力钻研文献学，于此领域取得博士学位。在他不断发表的诸多著作中，对文献学提出许多精辟见解。例如，他认为，中国的文献学，应以“文献制作、文献工作、文献发展、文献价值作为研究的主要领域”，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身体力行。他还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例如，他着力重点研究“民国年间”的出版史实，进而探讨当代出版业中的重大问题。在《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一书中，首次提出“新图书出版业”的概念，除了自己的研究以外，还指导了近二十篇博士、硕士论文，形成一整套“众星拱月”的系统与态势。他大力进行“阅读文化研究”，所编写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十本书》、《塑造中华文明的二百本书》等著作，在海内外

产生了巨大影响。

据我长时间观察，王余光同志是很想当一位粹然学者的。他愿意以山野散人身份博取更多的研究学术的时间。他广交学术界师友，也是为了在学术上提高自己。可是，由于他广通声气，极有人缘，就被认为善于领导学术部门，时势推移，只可勉居台辅，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他自我系毕业十年后便升为教授，十二年后担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副院长。自调回我系后，连任系主任至今。他还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如八臂哪吒一般，应付各方，游刃有余。在这方面我对他也极为佩服，佩服之至。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一向以首先服务于图书馆学界为职志，多年来大力支持学者出版著作。我对该社一向是佩服的。承蒙社领导和同志们不弃，曾掷下一封“顾问聘书”，那是十多年前的的事了。可惜我毫无建树，自觉赧颜。此次为余光出选集，是一件好事，于私于公，总觉得应有点表现。因此，自告奋勇，倚老卖老，为之呐喊几句。敢于向读者推荐的是，您只要读下去，如入宝山，定有收获。是为序。

白化文

2007年9月29日 星期六 紫霄园

目 录

论文献学	(1)
再论文献学	(13)
论历史文献的解释	(22)
试论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35)
20 世纪中国文献学研究综论	(42)
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百年概述	(48)
近五年(2000—2004)文献学研究的新进展	(61)
2005 年文献学研究述略	(67)
2006 年文献学研究进展	(80)
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述论	(92)
朱熹在辨伪学上的成就和影响	(100)
顾颉刚在中国历史文献学上的贡献	(110)
王重民先生的生平与著述	(118)
论张舜徽先生的读书治学与阅读指导	(122)
张舜徽先生的文献学成就	(139)
张舜徽著述提要	(152)
略论 20 世纪中国文献学家	(162)
现代文献学家海外访书的成就	(166)
史志书目补辑综论	(172)
史志书目补辑述略	(184)
主要论著目录	(212)

论文献学

“文献”一词，早在两千年前的中国汉语里已经出现了。孔子在《论语·八佾》中说：“夏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在这里，“文献”是指文字资料和贤能的人。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总序》中对“文献”作了较为具体的诠释，他认为，凡经史、会要、百家传记等书，信而有征者，谓之文；凡臣僚之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谓之献。可见“文献”是指文字资料和言论资料。这一意义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中国文献历史悠久，从甲骨文算起，已有三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往往由于真伪、是非、残缺、语言等种种原因，造成人们阅读和利用的不方便，这样，文献家整理文献就成了一项十分必须的工作。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就整理过《尚书》等文献，这是我国私家整理文献的开端。汉成帝时，政府组织人力整理藏书。自此以后，我国各个时期，对文献的整理几乎从未间断过。随着文献整理的广泛深入开展，一些专家在文献整理实践的基础上，随着对文献的认识和理解的加深，对文献整理的经验进行总结，写出了一些文献整理的理论与方法的著作，这些著作奠定了文献学建立的基础。然而，作为一门有理论系统的学科，文献学还正有待于建立。

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重视对文献学进行理论研究。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写有《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他们在该书的《例言》中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它主要是研究文献整理的一些问题。目前，比较

／
文献学与文献学家
／

2

有影响的文献学著作是张舜徽先生 1982 年所著的《中国文献学》。作者在书中认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过去称的校讎学，相当于今天的文献学。我们应“很好地继承过去校讎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学通俗化、明朗化。并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1]很显然，张舜徽先生是把对图书、资料进行整理、编纂、注释等工作，看做是文献学的主要内容。这里，我有两点不同看法：（一）文献整理，内容包括辨伪、版本、校勘、辑佚、注释、目录等，是具体的学术活动，不应看成是文献学的本身。（二）如果把文献学看做是研究文献整理的理论与方法的一门学科，那么，这至少是不全面的看法，这样的文献学是传统的文献学，或者称为文献整理学更为准确。

1986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作者在该书的《绪言》中认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所包括的内容就是广义的文献学，但“广义的‘文献学’是无法在课堂上讲授的；然而，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这方法要能够执简御繁，举一反三，譬如一把多种形状的钥匙，可以开启多样形式的锁。书籍既是智识的宝库，对它怎样开启，进一步怎样发掘、整理，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作者根据前人积累的经验，将文献学的内容规定为目录、版本、校讎三项。作者认为：目录是为了介绍文化遗产，版本是为了检择可靠的资料，校讎是整理材料的方法。这里，王欣夫所说的文献学，实际上就是宋代以来的校讎学。张舜徽先生在四十年代曾认为目录、版本、校讎之学，三者俱校讎之事。^[2]事实上他近年所讨论的文献学，也就是在校讎学内容的基础上加以增益的结果。

我在 1986 年写《中国历史文献学》一书时，对文献学研究的范围也有所论及。当时我认为：文献学是以文献整理的各

方面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具体说，文献学要研究文献整理的对象、整理的内容和方法及文献整理的历史。首先，要研究文献整理的对象。文献整理的对象即是文献本身，一个文献整理家，如果不对文献有所了解和认识，那么整理工作是难以开展的。文献学不仅要研究每一个体文献的资料来源、编著过程、体裁、体例、内容及其价值，同时，文献学还要把文献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去揭示它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过程，研究各个时期文献的特点及各个时期文献的继承性。文献学对文献的研究为文献整理提供了科学的基础。其次，要研究文献整理的内容和方法。前人文献整理的内容和方法主要有辨伪、版本、校勘、辑佚、标点、注释、翻译、书目、索引等。文献整理的内容和方法主要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实证文献的真实性、原本性与完整性，这就有了辨伪、版本、校勘、辑佚等方法；二是要解释文献的语言与内容，这就有了标点、注释、翻译等方法；三是要解决文献的排列顺序，为人们认识和研究文献提供方便，这就有了书目和索引等方法。文献整理的上述三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通过文献整理，人们可以有效而准确地获得可靠的、易于理解的文献。再次，是对文献整理历史的研究，文献学要考察我国文献整理的发展过程，总结前人文献整理的方法和经验，为今天文献整理的实践服务。^[3]现在看来，这样的规定仍然是不够全面的。

那么，一门有理论系统的文献学应该是怎样的呢？也就是说，在现时代，文献学应当担负起怎样的使命呢？

首先，文献应当是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主体，就是说，文献学不仅是把文献作为自己的研究手段，同时也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历史学、文学史、哲学史等许许多多学科，它们都需要研究文献，然而，它们研究文献只是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如历史学，它研究大量的历史文献，目的在于通过这些文献资料去揭示某一历史规律或某种历史现象，文献称为它的研究手段。文献学则不然，它研究文献，目的就在于要揭示文献本身。文献作为文献学研究的主体，使文献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了可能。

其次，文献学既是以文献为研究主体，那么，它应当是全面而系统地研究文献的一门学科，而不应仅摄取文献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特征加以研究。

基于上述两点认识，我们对文献学内容的描述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而文献学内容的具体构成又是受文献本身的特点所制约的。首先，文献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其他文化实体一样，有自己独特性的一面。因此，文献学要揭示文献的属性与构成，阐述文献的制作、流传、收藏的全过程，并从文献利用的实际角度出发，研究文献整理与揭示的方法和原则，为文献整理和揭示的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其次，文献又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产物，它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历史，这样，文献学必须要把文献放入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文献的发展、兴衰与历史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再次，文献是社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在人们生活 and 人类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文献学所不能不研究的。

一、文献的属性

文献是属于文化的范畴。关于文化，前文已作过很多定义，这里不再赘述。我认为，文化是人的精神作用于外部世界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一个有别于物质世界，也有别于精神世界的特殊领域，这个领域可称之为“文化世界”。文化的内容大略可包括三个方面：（1）人的规范的总体，如义务、价值、道德、教育等；（2）人类社会的总体，如家庭、民族、国家等；（3）客观知识的总体，如宗教、艺术、科学、语言、文献、机器等。很显然，文献是文化中客观知识总体的一个部分。知识以其存在形式可划分为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两部分，主观知识存在于人的脑子里，随着人的死亡而消亡，客观知识存在于人的脑外。文献就是客观知识与物质形式的统一体，其内容是客观知识，形式是竹木纸张等物质实体。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不管是科学书籍还是文艺书籍，一本书是一种物理对象。……但是使它称为人类精神品的重要产物是它的内容。版本不同，内容依然不变。”^[4]这样，我们对文献的属性

就有以下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文献不能纯属物质的范畴。我们平常提到的文献，不是指文献的外在形式，而较多的是指它的知识内容。现有一本历史书，一本物理书，假定它们的印刷、装帧、纸张等物理属性是相同的，然而它们仍不是同一本书。相反，我们所说是这样一本书，比方《中国史学发展史》，却可能属于不同的版本，物理属性全然不同，假如所有这些版本都包含同一内容，即同样的句子序列，那么，它们实际上是同一本书。这就是说，知识内容称为文献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文献也不是属于精神的范畴，因为它们一经产生，就完全脱离人脑而独立存在。

二、文献的构成

文献学关于文献属性的研究对进一步探讨文献的构成奠定了基础。文献是一定的物质属性（具体形态）与一定的知识内容（抽象形态）的统一体。文献的具体形态主要由如下四个部分组成：（1）文字形式。文献的知识内容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文字形式才能得到体现。文字形式又可分为两种，一是不同语种的文字形式，如汉文、藏文、英文等；一是同一语种的不同语言形态，如汉语中的文言文、白话文等。目前有人认为，文字不是文献的唯一记载手段，文字之外，诸如图画、符号（如乐谱的音乐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记载的知识，这些知识实体也可称为文献。这一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2）载体形式。文献的知识内容通过文字手段，又必须要体现在一定的载体上。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文献是楔形文字文献。约自公元前四世纪末期开始，一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楔形文字曾被用来书写过许多语言，最早的楔形文字文献是苏美尔语文献。这种文献是用一支斜尖的笔划写在软泥板上的。可知最早的文献载体是软泥板片。在古代，印度人以棕榈叶为书写材料，埃及人用纸草作为书写材料，后来把经加工过的羊皮作为“书写的纸”。在中国，最早的文献是甲骨文，龟甲和兽骨成为文献的载体，后来代之以竹木布帛，直到纸的发明。纸成了目前世界上最通用的文献载体。随着科学的发展，如胶片、胶卷、磁带等

／
／文献学与文献学家／
／

6

新型的文献载体也出现了。(3) 书写形式与印刷形式。印刷术发明之前,文献是以手写的形式出现。印刷术发明后,写本仍然存在,只是不作为主流而已。在中国古代,印刷术发明,文献始用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近代以来,文献的印刷逐渐运用铅印、石印和影印等。(4) 装帧形式。在中国主要有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平装和精装等。文献的装帧与文献的载体和印刷极有关系。近代前期,文献是用手工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使用软纸和线装。机器印刷术输入中国后,纸张和装帧也随之发生了变革,原先手工制作的软纸不仅产量低,成本高,不能满足书籍的大量生产,而且软纸不便双面印刷,相当不适用,这样“洋纸”就应运而来取代了软纸。“洋纸”进行双面印刷,原先的线装就不得不改革,因而新式图书的平装和精装也就产生了。

文献构成的另一方面是文献的抽象形态。抽象形态包括文献的知识、体裁与体例。知识内容是构成文献的必要因素,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说:“几乎每一本书都是这样:它包含着客观知识,真实的或虚假的,有用的或无用的。”^[5]与知识内容相联系的是文献的体裁与体例问题。体裁与体例都是知识内容的表现形式。体裁往往是就各类书(或文章)之间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说的,如文学作品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史学著作有纪传体、编年体、章节体等。体例是指一书内容的组织结构和表述形式,如书中的记时、记地、记人的方式,标目、征引的格式等,都是体例的具体表现。

文献学对文献构成的研究,不仅使人们具体认识了文献的各个组成部分,同时为文献的分类研究提供了基础。文献的分类是以文献构成中某一特征来作为分类的标准的。以文字形式分,则分汉文文献、英文文献、藏文文献等;以载体形式分,则可分为楔形文献、甲骨文献、帛书等;以文献的知识内容分,则可分为文学文献、历史文献、数学文献等;以体裁形式分,则可分为散文文献、戏曲文献、编年体文献等。

三、文献的编作、流传与收藏

上述两个问题是对文献主体的直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

文献学需要研究文献从形成到被收藏这一完整的运行过程。文献的形成分为两个环节，即文献的编撰和文献的制作。文献的编撰又可分为编撰方式和编撰过程两个问题。编撰方式，自古以来主要有作，或称著、撰等，这是作者的创造，孔子所谓“述而不作”，就是说只阐述前人成说，自己不敢有所创始。又有记，或称志，是记录、记载，非专尚议论，以叙事识物为主。编写，或称编撰、编纂，是就现存的材料加以整理，写成文章或书。编辑，是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编撰过程，是研究文献在编撰中所依据的材料。研究文献的编撰方式和过程，更有助于对文献内容的理解和文献价值的揭示。文献形成的另一环节是文献的制作。制作的内容包括对文献原稿的加工、设计、制版、印刷和装帧的过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编辑与出版。同一文献可能会经过多次编辑和多次刊印，这样就会形成多种版本。一本书的同版本，往往反映了该书的内容和形式的不同。

文献无论是原始的手稿，还是经过传抄、刻印或出版，形成各种抄、印物或出版物，它都有可能在社会上流传，流传是文献社会意义的重要手段。文献的流传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可称为市场性流传，一种可称为阅读性流传。文献进入市场流传，就成为一种商品，可以标上价格，在书场、书肆或书店中出售。文献阅读性流传是通过阅读进行流传，文献只有被阅读，其内容才可能得到流传和利用，这也是文献的社会意义和生命力所在。

文献的收藏，不是文献流传的终结，而是文献流传的手段或途径之一。自古以来，无论是公藏还是私藏，其藏书的目的或供人阅读和利用，或为流传后世。司马迁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藏还是为了传。无论从空间意义还是从时间意义上说，流传是藏书的价值所在。

文献的编作、流传和收藏三者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文献的编作量影响着文献的流传量与收藏量，流传途径的广泛与畅通与否，制约着文献的出版与收藏，收藏能力的大小又直接影响到文献的出版与收藏。

四、文献的积累与兴衰

藏书为文献的积累提供了条件。中国人藏书，是个由来已久的嗜好，中国文献的积累浩如烟海，这两者是有直接联系的。研究历代文献的类别和数量，以从中窥探中国文献的积累、兴衰与发展，这是文献学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

据有关统计，我国于1980年以前，各时期出版的图书共计有809157部，其中：

西汉及西汉以前（公元25年前）	1033部
东汉（25—220年）	1100部
三国（220—280年）	1122部
晋（265—420年）	2438部
南北朝（420—589年）	7094部
隋唐（581—907年）	10036部
五代（907—960年）	770部
宋（960—1279年）	11519部
辽金元（906—1368年）	5970部
明（1368—1644年）	14024部
清（1616—1911年）	126649部
民国（1911—1949年）	100000部（约数）
1949—1980年	527402部 ^[6]

以上统计，仅是图书的数量，尚不是文献的全部。图书以外，目前出土的甲骨文献有15万片，带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上万件，石刻资料约20万件，发现的简牍约4万枚，敦煌遗书约5万卷（件），吐鲁番文书2700多件。历史档案约3000万件，尚不计海外和非档案馆单位所藏的历史档案。此外，近代以来，我国还出版印刷了大量的报刊文献和内部资料。

从这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到：（1）中国丰富的文献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这一积累不仅是旧文献的保存，同时也是新文献的增加。（2）中国各个时期文献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体现在文献发展过程中的兴与衰。为什么文献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兴与衰呢？这我们只能从时代的大背景中去寻求答案。